

女性人类学译丛


[澳]凯萨琳·谢菲(Kay Schaffer) 著

侯书芸 刘宗艳等 译

于闽梅 校订

丛林、性别与 
澳大利亚历史的重构

The Bush, Gend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stralian Histor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性人类学译丛

作者: [澳]凯萨琳·谢菲(Kay Schaffer)

译者: 侯书芸 黄薇 张新 张君

王海生 刘宗艳 余迪

校订: 于闽梅

丛林、性别与 澳大利亚历史的重构

The Bush, Gend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stralian Histor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丛林、性别与澳大利亚历史的重构 / (澳) 谢菲
(Schaffer, K.) 著; 侯书芸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女性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5633-9756-3

I. 丛… II. ①谢…②侯… III. 女性—社会人
类学—文集 IV. 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08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前言^①

一、导论

1972年,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我尚是一名硕士研究生,与我的先生及两个年幼的女儿在美国居住。像许多大学生一样,我们也参与了反对越战的斗争,并且一直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寻找未来可能的出路。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执政25年的战后保守政府倒台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刚刚当选为工党主席(1972—1975)。他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政策是,对所有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这项政策旨在迅速扩充高等教育部门。他的另一项措施是设置了一个女性顾问,对基于性别上歧视女性的法律进行审查,并对女性进行教育、社会和法律等形式的补救。我和我的先生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些发展,对渐渐开展起来的改革之风称赞不已,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申请学术职务。他的专业是社会学,一个亟需人才的新型学术研究领域;我的专业则是文学与文化研究,虽然澳大利亚的学院和大学均开设有英美文学课程,席位难求,但我依然成功地谋得了一个职位。我很希望对澳大利亚的文学和文化进行研究,但我很快发现,此方面的研究资料甚是稀缺。至于文化学和妇女学,这些交叉学科还远未出现。当然,如今,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离开美国之前,我曾支持女性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而且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匹兹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积极参

① 本文译者为侯书芸。

与了一场介绍妇女研究课程的活动。为了说服我们大学的领导意识到这门课程的价值,我们整整努力了三年。1974年,在我们那所大学,第一期女作家课程即将开课,而我即将成为硕士生导师;然而,最终这项计划只能搁浅,因为我先生和我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我们决定迁居回国。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时,欢迎我们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年轻的国度,它的机体里充斥着各种新观念,并将自己视为正在进行社会民主实践的一个基地,此实践要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机遇,而我们也渴望得到参与这种愿景的机会。然而,很快,我便开始注意到想象和现实脱节这样一个事实。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澳大利亚,我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生活在这里和生活在美国的种种差异。和美国的情形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几乎没有女性身居要职。事实上,1973年以前,如果你是劳动力大军中一个拥有固定工作的女性,要结婚的话,你就必须得从那少有的固定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然后接受一个临时性的工作。这样,你就会失去一个固定雇员的所有利益。如果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一个已婚妇女不能开设银行账户,甚至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进行采购或贷款。虽然这些歧视性法规正在逐渐得到改变,但父权制的观念仍然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女性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使我生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探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澳大利亚和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讲英语的民主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澳大利亚也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文化。它不仅从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统计和文化属性上来界定自身,而且通过比较自己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差异,界定对自身的描述以及理解本国历史的方式。这些因素远远超越了那个国度因之闻名的那些符号——炙热的大地、辽阔的天空、袋鼠、桉树、伙伴情谊和澳新军团(Anzac)的传奇,还有那些更加消极的模式化观念,包括厌女症、种族主义和对文化差异的忧虑。我煞费苦心地调查这些现象。当然,在这些年里,澳大利亚逐渐成熟起来,世界也更具

全球性和本土性,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此期间,澳大利亚日渐国际化,和它的亚洲邻居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同时,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并且渐渐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国家,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时地反省自己过去的殖民观念对原住民的生活和文化所造成的危害。

30多年过去了,我在澳大利亚居住、工作,并成为这里的公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学者和文化批评家,我一直尽心于我的学术事业。1978年,我和其他有志于此的同事们一起,协助引进了第一批妇女研究学位中的项目之一,这个项目一直持续至今。在那段时间里,我运用我的文学、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分析工具,发出了诸如此类的询问:“作为(或界定)一个澳大利亚人意味着什么?”“澳大利亚的妇女是什么意思?”“澳大利亚土著或澳大利亚族人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之所以问这些问题,目的并不是寻求答案,而是寻找观察身份定位、激发欲望以及可能的矛盾及其断层线的方式。这本论文集里的文章体现了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它们运用散漫的、符号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发问方式,打破了关于身份差异的观念。它们总是留心语言建构的相同或不同方式,尤其在性别差异方面。我希望这些论文可以起到和中国读者进行交流的作用,尤其在澳大利亚独特的文化属性方面,因此希望译者能尽力用新颖或有趣的方式把它们译出来。

二、论文概述

本书收入了我的11篇论文。

前五篇论文研究的是澳大利亚的历史话语和小说话语。这些文章采用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考察了19世纪澳大利亚的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以及它们试图用来定义澳大利亚民族和族人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与母国英国并无关系,而与土地及澳大利亚

丛林有所关联。土地在澳大利亚的想象中令人担忧,对于新的定居者而言,它并不像美洲的土地那样,被想象和描绘为物产丰富、适宜人居的地方。在澳大利亚早期的探险者和定居者看来,土地无疑是邪恶的,因为它是如此陌生,它经常被艺术家用绝望的语气描绘成残酷的母亲,或是需要与之争斗的敌人。也就是说,为了把澳大利亚界定为与土地相抗衡的形象,话语叙述是性别化的;事实上,它更倾向于依赖性别差异。这种话语通常把探索者设想成一个男性英雄,一个未来的征服者,他需要面对恶劣的、易变的、顽固的女性化的土地。“他”是具有男性气质的主体,而“她”则是被控制和被征服的非常被动的对象。在前两篇文章里,我对这种建构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在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中,真正的白人妇女是非常罕见的。那时,澳大利亚的土地被大约 250 个原住民部落所占据,而这些部落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缺席的。澳大利亚被描绘成“无主的土地”,一片空旷的荒原。这是一个否定了土著文化、身份、权利以及其土地所有权的词语。然而,土著妇女往往有悖于自己的意愿,被视为白种男人的伙伴。尽管如此,土地仍被视为“没有女人的一席之地”。当真正的(白人)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时,她们经常被描绘成站在男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立场进行维护的形象。19 世纪 90 年代,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年代。此间,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民族主义作家——亨利·劳森(Henry Lawson),以他的丛林诗歌和短篇小说声名鹊起,《牧人之妻》(*The Drover's Wife*)应该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短短七页的篇幅里,他描绘了那些默默承受苦难、英雄般坚忍的丛林女性,她们粗砺而热烈,一如澳大利亚的丛林本身。当她们的丈夫在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牧羊时,她们不得不用不堪一击的丛林小木屋来抵挡洪水、火、旱灾和毒蛇,进而保护她们的孩子。她们成为理想化的丛林女性。我的论文介绍了劳森和他的批评者们对女性符号化表达的多种方式。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 19 世纪 90 年代,芭芭拉·贝因顿(Barbara

Baynton)也发表了有关丛林女性题材的短篇小说。虽然她不像男同行那样有名,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她几乎不为人所知,然而,事实是,她与劳森在同一时间写作。她极为蔑视劳森所坚持的男性立场和男性特权。在她这篇引起轰动的自然主义的小说中,女性不仅遭受了恶劣的来自土地的自然灾难,而且还要忍受男人、教会、法律、两性道德观和丛林传统等对她们进行的联合统治以及对她们身份的消解。我读了她的短篇小说《“被选定的容器”》(*The Chosen Vessel*),这是一篇对劳森的《牧人之妻》进行解构主义回应的作品。

第五篇文章,我对澳大利亚殖民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进行了分析。在芭芭拉的叙述中,这个事件是这样的:一艘叫做“斯特灵城堡”号(*Stirling Castle*)的英国商船不幸发生海难,船长“有教养的”妻子——白人女性伊莱扎·弗莱哲(*Eliza Fraser*),在“凶残的土著”手里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囚禁生涯,最终得以逃脱。从这个故事问世的19世纪30年代到现在,它一直都是大众神话和通俗小说的主题,而且也是澳大利亚本土和海外知名艺术家在众多小说、戏剧、诗歌、绘画和电影中竞相表现的对象,这中间包括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人之树》(*A Fringe of Leaves*)。我的这篇论文则采用了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表述在规范种族、阶级、性别之间,以及帝国、殖民地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辅助角色进行了讨论。

第六篇至第十一篇论文关注的是20世纪的事件,其中后四篇与澳大利亚相关,前两篇的视野则更为广阔,聚焦于国际范围内的女性主义事件。

第六篇、第七篇《恐怖词:“女性主义”、后现代消费文化和媒体》和《“虚拟网络系统母体”中的酷女郎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对女性主义的媒体研究。《恐怖词》考察了“女性主义”这个词语是如何(也许是为何)被误解的,尤其是在媒体中。在众多媒体中,女性主

义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它并不是为争取平等而进行斗争，而是持有非天然的反母职立场，甚至威胁到家庭观念。该文基于“女人要什么？”的调查，分析了阿德莱德报纸上的一系列文章。它揭示了媒体是如何化用“女性主义者”的言论，在标榜“客观”的新闻工作掩盖下，微妙地刻画出其刻板印象。《“虚拟网络系统母体”中的酷女郎们》采取了一种与上文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网络女性主义艺术家们（其中两个是我在阿德莱德[Adelaide]大学开设的妇女研究课程的学生）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些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技艺纯熟的游戏，它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性别惯例和性别视角。这些艺术家为游戏的使用者创造了有趣、解构、互动的环境，由此，我探讨了艺术家是怎样挑战性别建构及其影响等问题。

第八篇、第九篇文章论及的是被盗掠一代(Stolen Generations)在当前的人权问题。在1910—1970年间，这些混血儿童被政府从他们的原住民母亲那里强行带走，并美其名曰“保障他们的安全”，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和痛楚。1997年，这个事件以国家的名义凸显出来，标志性事件是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详述了孩子们和他们家人的痛苦经历，指责政府应为这起令人震惊的人权虐待事件负责。报告的原话说，这简直是在进行文化灭绝。直至今日，尽管有州政府、教会、社会团体和组织已经作出上述举动，霍华德国家政府(Howard national government)仍然拒绝为此事进行公开道歉，或为这些仍然被痛苦阴影笼罩的个人和家庭负责。第八篇叙述了被盗掠一代的历史和澳大利亚政府对此的反应。第九篇文章(与艾米莉·波特[Emily Potter]合著)考察了道德责任与流行电影《漫漫回乡路》(*Rabbit Proof Fence Examines*)的关系。该电影讲述的是三个被盗掠的孩子的苦难经历。影片上映后，澳大利亚土著被盗掠一代引起了国际关注。论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修改小说的权限的问题。当代的电影拍摄可以再现事件发生时的情景，但小说文本复杂的历史背景无疑对此进行了挑战和质疑。

第十篇、第十一篇文章采取了更为国际化的视角。第十篇文章是从我最近与人合作的《人权与叙述生活》(*Human Rights and Narrated Lives*, 与西丹尼·史密斯合著)一书中摘取的一章,它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当全球五个地区兴起人权运动时,已发表的活生生的叙述对其产生的作用。该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日军性奴役的受害者姗姗迟来的讲述。老奶奶们,这些勇敢的女性加入了这场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运动,并认识到战争期间日军对女性所犯下的罪行导致自己遭受了苦难。论文详述了她们被迫沦为娼妓的历史,以及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国际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前,她们为自己的这段历史而感到的羞耻和沉默。这次大会讨论过波斯尼亚战争中令人发指的妇女受虐问题之后,会议主题随即转向了妇女在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并被迫去做性奴隶的事情。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在全球女性主义活动家的支持下,那些受害妇女开口讲述了她们的经历,对自己的过去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将其作为国际人权受虐案件上诉到国际法庭。尽管她们作了大量的努力,日本政府却仍然拒绝为此承担责任。论文集最后一篇,第十一篇的主题是奥运会。毫无疑问,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篇文章作于2000年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之后,探讨了人们对女运动员的诸多态度。其中最糟糕的问题是:“难道她们是天生的怪胎?”这和《恐怖词》一文其实是用相同方式提出的同一个问题,它阐释了在20世纪的媒体中,女运动员的身体如何成为欲望、恐惧和规则的场所。该文以积极的论调结尾,承认由妇女们自身和媒体人士共同努力所促成的进步,是通过让妇女的运动变得危险性更小来达到的,这样,观众们就能在21世纪的现在充满钦佩之情和敬意去欣赏女运动员的能力、威力、力量和体形。

三、结语和鸣谢

我把这本书稿视为中国读者了解澳大利亚的一扇新窗口,因为中国读者对澳大利亚除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刻板印象外,其实知之甚少。澳大利亚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国度。中国人民和澳大利亚人民享有许多人性的共同之处——包括慷慨、友谊和人们之间的合作精神。我从我的中国之行,以及与那里许多聪明、勇于探索的女诗人和女作家的交谈里得知,澳大利亚女性和中国女性同样具有一种愿意并乐意对自身进行新探索的精神,和在一个更为公正的世界上寻求生存的新方式的精神。我将这本书作为友谊、理解和姐妹情谊贡献给中国读者。我希望这些文章可以有助于您理解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使它对您来说少一些陌生和遥远。

在行将结束此文之际,我非常感谢荒林女士,感谢她对我这本合集的兴趣,以及她为促成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所作的努力。2005年,她在一笔国际基金的资助下,到澳大利亚来进行学术访问,并在许多大学讲述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状况,这种传播文化的方式使许多澳大利亚听众深受启发。她对我的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建议我将过去20年里发表的这些文章集结出版;因为她认为,它们将会引起中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我对她的努力非常感激,同时也非常感谢中国的专业译者,她们乐于承担这些艰难的翻译工作,而且工作效率极高。此外,我同样深深地感谢我在阿德莱德大学从事亚洲研究的同事宋宪林博士,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翻译家、口译员黄平和周家新,他们阅读了中文译稿的部分章节,而且咨询了关于澳大利亚的术语转成中文的翻译方式。和他们一起工作使我获益匪浅,这是我最可宝贵的经历。

目录



- 作者前言 / 1
- 丛林和女人 / 1
- 土地表象与澳大利亚国家身份认同 / 42
- 芭芭拉·贝因顿:女性如“被选定的容器” / 60
- 亨利·劳森、牧人之妻和批评家们 / 80
- 伊莱扎·弗莱哲的故事以及建构在
性别、种族和阶级上的澳洲文化 / 99
- 恐怖词:“女性主义”、后现代消费文化和媒体 / 122
- “虚拟网络系统母体”中的酷女郎们(节选)
——挑战网络空间的性别认同 / 147

全球和本地语境下对被盗掠一代的叙述 / 177

《漫漫回乡路》:伦理关注与观众反馈 / 195

迟到的叙述:“老奶奶”讲述二战时被性奴役的故事 / 216

奥林匹亚的女儿们:自然或文化的怪胎? / 255

汉英主要名词对照表 / 266

译者后记 / 278

丛林和女人^①

丛林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是真正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

——弗朗西斯·亚当斯(Francis Adams)《澳大利亚人》

丛林这一核心形象代表澳大利亚的民族特征。弗朗西斯·亚当斯，一位于19世纪80年代从英格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记者，曾经写道：“丛林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是真正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1893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一本旅行手册，书中他把“真正的丛林人(bushman)”赞为“民族之人”。^②但是，在他的赞誉中也隐含着一种消极的观念，这种消极的观念则与丛林的危险生活相关，这种危险在后来众多作者那里开始被表述为：“没有女人的一席之地”的丛林^③。亚当斯指出：“澳大利亚的英国

^① 源自《女人和丛林》，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印刷地点：伦敦、纽约、墨尔本，第59—76页。本文译者为黄薇。

^② 弗朗西斯·亚当斯的《澳大利亚人》(伦敦，1893)，转引自万斯·帕尔默(Vance Palmer)的《90年代的传奇》，第47页。

^③ 亨利·劳森的一篇短篇小说的篇名，而且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侨民比沿海或乡镇的居民更快地消亡,或者被吸收到丛林内部。”^①亚当斯的描述揭示了几个为人所熟知的关于描述澳大利亚传统的代表话语:男性作为标准(male-as-norm)而大地作为他者(land-as-other),丛林是中心而城市被定义为边缘,丛林的化身是中心,内部有一种神秘的存在,它召唤着人们去探索发现,但它也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要么被毁灭要么被吸收。

当亚当斯写到丛林中的死亡时,他可能一直在思考着伯克(Burke)和威尔斯(Wills)的命运。这两位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探险家,于1861年7月尝试由南至北横穿大洋洲时不幸遇难。他用“吸收”(absorption)这个术语暗示丛林的力量,就像原始的母亲幻想着吸收她的居民,把他们同化到同一等高线(contours)上,掠夺他们各自的特性。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幻想。这是女性在丛林传统中出现的一种方式——虽然这并非居住在丛林里的女性的实际形象,却反映了丛林本身。这种景观使得一个女性他者作为丛林英雄的对立面被建构起来。更进一步,这些叙述使得读者也处于主观建构的过程之中。丛林作为一个想象力的产物,能吸收大地,能吞食它的居民,这一幻想通过历史、小说、电影的叙述广泛传播,这一想象性建构也对人类活动具有意义。

这一特别的幻象在当代文化中继续流传,从影片《悬岩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中可见一斑。这部电影由彼得·韦尔(Peter Weir)执导,取材于1967年琼·林赛的同名小

^① 弗朗西斯·亚当斯的《澳大利亚人》(伦敦,1893),转引自万斯·帕尔默的《90年代的传奇》,第47页。

说,据其宣称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但是在影片广受称誉、备受关注之时,出版商才透露本书所谓的“真实”只不过是噱头而已。这部影片1975年首映,并且在1976年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广泛好评。评论家们称赞影片描绘了“澳大利亚丛林令人敬畏且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它令一些人远离,却也凭借自身迷幻般的力量将一些人吸引”^①。影评将这部电影与澳大利亚传统隐喻的意义、形象和修辞相连。

电影的运作不同于文学的叙述。在电影中,电影制作者和观众都积极地参与了电影意义的制作和建构。尽管电影文本似乎是要把对真实世界的反映再现给观众,它通过技术手段(音乐、音响、视觉、对白、灯光、剪辑、镜角、焦距等)达到效果,但是它也通过具有代表性的蕴含着符号和话语(意识形态的符号和表象、政治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和类似的话语)的典型来表现。另外,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所解释的那样,“电影提出无意识(由主导秩序组成)建构方法的问题,提出在观看时应怎样观看和获得愉悦的方法的问题”^②。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观看者提供了情爱的愉悦。观众被置于男性观看者的位置。他是凝视的主体,而女性则是被凝视的客体。凝视的主体有权力并能控制其客体,而作为客体的女性只是视觉上的符号和情爱的冲击,她暗示着“在海岬上被看”(《视觉快感和叙述性电影》,第209页)。在《悬岩上的野餐》中,观众的注意力被引向

① 安德鲁·帕克(Andrew Pike)和罗斯·库帕(Ross Cooper)的《1900—1977 澳大利亚的电影:特色电影制作手册》,第367页。

② 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和叙述性电影》,载《荧屏》1975年秋卷,第206页,以及有感于《太阳下的决斗》而作的《再论视觉快感和叙述性电影》,见《结构》15/16/17(1981),第12—15页。

神秘的澳大利亚景观和“生于斯，死于斯”的天真女生。开放式的结尾在观众与被观景观之间建立起联系。镜头最终定格在破晓之时浓雾弥漫的黎明。只有鸟鸣声打破这可怕的沉寂。晨雾下沉，观众在阵阵雷鸣声中远远地瞥见悬岩。当浓雾散去，观众的视角可以全面地看到场景的两个方面：长着干枯的草、矮小的树的荒芜贫瘠的平原和远处庄严而雄伟的火山岩。片名叠加在这个场景上，并伴有画外音，接着辨出这是米兰达(Miranda)的声音，她提醒道：“我们所看的和我们已经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梦。”影片的开始，叙事便尝试在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构建中介的可能性。根据拉康对概念的运用，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澳大利亚形象形成的例证。摄像机把镜头转向了干枯的灌木丛，女子学校的影像伴随着舒缓轻柔的风笛声。在宿舍里，观众看到睡梦中的米兰达面朝他们。她是孤独的、充满情欲的、卖弄风情的，也是“我们的”。当场景由自然切换到文化，从灌木丛到学校，从野蛮到文明，柔和而又令人敬畏的大自然之声被优雅的具有异国情调的风笛乐曲所取代。

观众从双重既定的视角积极地参与到电影的奇思妙想之中，三个年轻的女孩和她们的一个老师将会被吸收进丛林。这就是说，观众的情感认同把女孩和景观区分开来，女孩作为欲望的客体再现在银幕上。同时观众会把女高中生，尤其是米兰达，作为他们自己的镜像。这样两件事情便会在观众的主观意识中同时发生：一方面把女孩作为一个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主体建立起和她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把她作为观看者的物恋对象而分离出来。观众充满幻想和欲望地凝视着天真无邪、妙龄的、维多利亚式的(Victorian)少女，同时观看着如谜一般的岩石景观，这